清史纂修

清代黄马褂源流考

丁　超

清代黄马褂，是时代特色和民族色彩兼备的中国传统服饰。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指出清代“当时以为最特别重要衣着，即‘钦赐黄马褂’。事实上，在《康熙万寿图》、《乾隆南巡图》中，以亲王大臣在这两个大皇帝六十四人抬的大敞轿前排队步行所见而言，原来不过是在朝服外加套一件正黄色普通半长不短的马褂而已。”① 从传统史学角度对清代黄马褂的论述，首推郑天挺《“黄马褂”是什么?》。该文对清代黄马褂的类别和功用进行了简要归纳，并对武训是否赏穿黄马褂一事做了论断。文章认为黄马褂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政权，拿来收买、愚弄、麻醉他的仆从们的一种工具，本来值不得再谈。”② 不难看出，郑天挺与沈从文一样对清代黄马褂没有好感。对黄马褂的这种“蔑视”态度，加上作者所处时代赋予的局限性，使得上述研究难以发掘出黄马褂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

黄马褂作为在清代政治运作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工具”和“符号”，无疑是清代政治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一般认为，相对于传统汉族服饰而言，黄马褂在当时为带有“异民族”（或称“非汉族”）色彩的服饰。而相对于汉人建立的明朝政权来说，清朝则是满族上层建立的所谓“异民族”政权。黄马褂既然充当了政治“工具”，那么这种“工具”的形制、赏赐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无疑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探讨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③，证明了通过服饰制度深入政治史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遗憾的是，即便对黄马褂的名物考订也仍有讹误之处，更不要谈论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在澄清清代黄马褂本意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赏赐黄马褂的政治行为，借此管窥清代政治文化特征之一斑。该研究的发端，无疑当从形制、性质上梳理黄马褂的本源，探究其在服饰发展史上的源流，是篇即为此而作。

一、清代黄马褂的形制及皇权特性的衍生

对清代黄马褂的研究，无疑应以准确把握基本概念入手，这也就离不开传统的名物考证。诚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④ 黄马褂这一词汇的内涵，必须置于清代的时代背景加以考量。

（一）马褂的性质与类别

马褂，实为行褂之俗称。单从名称上看，马褂便于马上民族使用。据《大清会典图》可知，行褂，与行冠、行袍、行裳、行带等一起，均属于行服的范畴。行服则与朝服、吉服、衮服、补服、常服、雨服等并列。顾名思义，行服是为外出行走而设计的服饰。在

[收稿日期]　2010－11－10
[作者简介]　丁超（1979—），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北京 100872

《皇朝礼器图式》中，行冠、行褂、行袍、行带、行裳等均以“行营冠服”名义附于《武备卷》下，而不被列入《冠服卷》。可见，行服更接近《武备卷》中所列举的各类甲胄，在性质上更富于“军事”色彩，更注重实用性。这与追求富丽堂皇的宫廷礼服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皇朝通志》对行服的色泽、款式、质地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⑤]，兹不赘述。

行褂又名行衣。据乾嘉时人昭梿《啸亭续录》载：“又燕居无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归，喜其便捷，名‘得胜褂’，今无论男女燕居皆著之矣。”[⑥]另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载：“健锐火器二营兵丁，前因起身匆促，未及携带皮衣，臣已制备皮得胜马褂一千八百件，毕沅处亦办二百件，陆续运送军营，分给以御冬寒。”[⑦]虽然上引两处文献所指战事不同，但时代相近，且“得胜褂”和“皮得胜马褂”显系同一款式衣物。既然《啸亭续录》将“行衣”与“得胜褂”并举，则“马褂”显然可视为“行衣”之一种。又据《啸亭续录》可知，行褂既便于军旅，也适合在家闲居。这种普遍适用性有赖于行褂“长与坐齐，袖长及肘”的款式特征。行褂之所以被称为马褂，也正是由于其便于马上骑射时穿着的缘故。晚近学者章炳麟在《訄书·订礼俗第五十一》对满洲服饰的源流及地位进行了考察，对加深了解马褂的性质大有裨益：

> 昔诸葛亮造筒袖铠，宋明帝以赐王玄谟。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军容入国，以便趋走，亡咎。若其右方重衽，温暖不均于左。削袂上起而合手者，如拚矣。婴络以效桑门，缝绳以被毡笠，比是观之，将相惊以精魅。[⑧]（着重号乃笔者所加，下同）

章炳麟将满洲服饰的渊源归结为蜀汉时期的筒袖铠，似欠稳妥（具体论述详后）。但其对满洲服饰本质的探讨则合乎情理。从“军容入国，以便趋走，亡咎”一语，可以看出章炳麟对满洲服饰合理性的肯定，这种合理性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如果满洲服饰采用中原地区的右衽，则身体左侧只有一层衣服，而右侧则有两层衣服（即“重衽”），这就会造成身体左右两侧冷暖不均。对于生活于寒冷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而言，确保衣服的保暖性显然必要。第二，衣袖过长，则不便于双手的灵活使用。对于马上民族而言，控驭马匹，舞刀弄箭必须排除衣袖的干扰，保持手腕的灵活性。所以，满洲服饰要“削袂”。满洲崛起于东北地区，其气候比中原地区寒冷，必须考虑服饰的保暖性能。而她又是骑马民族，必须考虑到服饰的便捷。无疑，马褂就是包含着上述合理性的满洲服饰。

（二）黄马褂的皇权特性

黄马褂的特性，首先在于其便于骑射的物质特征，其次在于其作为皇权象征的崇高地位。

黄马褂就其款式而言，基本特征在于便于骑射，这一点通过与“峨冠博带”、“宽袍大袖”的明代服饰相比较，显得尤为突出。

清代行褂在色泽、面料上、款式上有较大差别。就色泽而言，黄色只是其一，且有明黄、金黄之别。那么，什么是黄马褂，黄马褂何以在众多马褂中能“一枝独秀”，活跃于清代政治舞台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清代服制的色泽规定中，黄色有明黄、金黄、杏黄等多种类别。“黄马褂”只是一个概念相对含糊的通称，其内涵远非“黄色的马褂”这样简单。从理论上讲，明黄色、金黄色、杏黄色的马褂均可称之为“黄马褂”。但在清代政治生活中唱主角的黄马褂却只有一种。实际上，黄马褂确有明黄色和金黄色之分。据福格《听雨丛谈·黄马褂》载：

> 巡行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皆例准穿黄马褂，用明黄色。正黄旗官员、兵丁之马褂，用金黄色。勋臣军功有赏给黄马褂、赏穿黄马褂之分，赏给只所赐一件，赏穿则可按时自做服用，亦明黄色。[⑨]

另据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载：“八旗扈从官员马褂，各按旗色，旧制也。日久渐弛。嘉庆六年，命随围之都统，毋庸按照旗色；副都统未赏黄马褂者，俱按旗色服之。”[⑩]这里的“旧制”等同于《皇朝通志》中的“各如旗色”。这样，清代黄马褂在泛指意义上，有明

黄色马褂、金黄色马褂、镶白边黄马褂、镶蓝黄马褂等多种类别，而狭义上的黄马褂则专指“明黄色马褂”。

明黄色，又称鹅黄色。因此，明黄色的黄马褂又可称为“鹅黄褶”。清人袁枚曾评论说：“本朝赏花翎、黄马褂，最难着笔。公诗云：‘冠飘孔翠天风细，衣染鹅黄御气浓。’庄雅独绝。”[11]此处提及的诗作就是高其倬从驾避暑山庄时所作的《射堂》诗。这里的鹅黄色衣服显然就是黄马褂。又如，吴振棫《木兰词》载“高冠孔翠彩璘彬，衣上鹅黄色更新。”[12]该诗注称“每日未刻，收围路中，诸蒙古献禽者分赐黄马褂、孔雀翎。”显然，诗中的鹅黄色衣也只能是黄马褂。再如，清人高士奇《从猎》诗载“班联翡翠翎中坐，队入鹅黄褶里行。十二羽林皆健将，只容款段一书生。”[13]该诗末位注称“臣班在亲随侍卫之列”，据此可知，高士奇也是佩戴翠翎，身着鹅黄褶，只不过他的身份不是行伍，而是文人。诗中的“鹅黄褶”理应为“黄马褂”。

这里有一处值得注意的矛盾现象：既然清人诗中称“衣染鹅黄御气浓”，则黄马褂的明黄色直接体现出“御气”（或称帝王之气），应该是皇权的象征。但前引清代政书已明确说明皇帝的马褂是石青色的。倘若皇帝不穿明黄色马褂，则受赏马褂者又将何以沾染“御气”呢？这也就引出了皇帝本人是否穿黄马褂的问题。学界一般囿于清代典章中“皇帝行褂，色用石青”的记载，而误认为皇帝并不穿着黄马褂。例如，朱家溍对《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关于荣禄受赏黄马褂一事的记载和注解进行了订正，并进而指出：“赏穿黄马褂并不是皇帝将自己衣库里的黄马褂赏给有功的臣工，因为皇帝衣库里没有黄马褂……从以上所举实物、画像、文献，说明皇帝不穿黄马褂。”[14]限于条件，本文无法像朱家溍那样容易利用清代实物和画像去探讨清代皇帝是否穿着黄马褂的问题。然而，仅从历史文献来看，确有皇帝穿着黄马褂的记载。《清高宗实录》记载了发生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的如下事件：“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深堪嘉尚，兹班师在迩，特解亲御黑狐腿黄马褂，先行随报赏赐。”[15]既然是乾隆帝“特解亲御黑狐腿黄马褂”，那这件黄马褂穿在皇帝自己身上是再明显不过了。乾隆帝的黄马褂在当时肯定放在皇家衣库里，只是今天已逸散了。另据《清文宗实录》载：“（咸丰三年十月）甲申，谕内阁：胜保奏《攻剿独流逆匪大获胜仗》一折……著发去黑狐腿马褂一件，珊瑚豆大荷包一对，交胜保祗领……”[16]咸丰帝发去的“黑狐腿马褂”，在性质上理应等同于乾隆帝的“亲御黑狐腿黄马褂”。今人在画像和故宫馆藏中没有发现皇帝穿着的黄马褂，或许只能说明皇帝并不经常穿着黄马褂。

此外，黄色在清代服饰制度中是皇家专用色彩，象征着皇权。倘若皇帝自己不穿黄马褂，而专门为臣属设计黄马褂，似乎有悖于常理。早在顺治八年四月，就已经“禁和硕亲王以下及官民人等帽缨擅用丝线，衣物辫繸镶边擅用鹅黄、柳黄色”[17]，也就是说，和硕亲王以上可以使用鹅黄色、柳黄色。雍正帝胤禛也曾追述说：“当日世祖章皇帝御极，正在冲龄。睿亲王辅政，大权在握，一日以黄色衣示在廷大臣，询问可否衣著。而彼时大臣，尚力争以为不可。”[18]言外之意，黄色衣只有皇帝才能穿着。此外，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定文武各官雨衣品级。礼器馆总裁于敏中等奏：恭查御用雨衣、雨帽，用明黄色；一品大臣以上及御前行走侍卫、各省巡抚，用大红色……”[19]这则是清代皇帝在服饰中明确使用明黄色的例证。据此推断，清朝皇帝穿着黄马褂合乎常理。

之所以造成皇帝不穿黄马褂的假象，与这种黄马褂多称为“黄面褂”有关。据《听雨丛谈》之“黄面褂”条载：“赏给御用貂褂，须拆下黄面恭缴。若有赏给御用黄面褂字样，即不必拆缴。”[20]可见，黄面褂是“貂褂”和“黄面”一里一外组合而成的马褂。皇帝的马褂本来就有“棉、袷、纱、裘”四种质地，貂褂即其中的裘褂，至于其他三种质地的马褂，其颜色理应也是黄色。

二、华服还是胡服？——清代黄马褂的源与流

学界一般认为黄马褂乃满洲人入关之前所

独创，明代及以前并无此物。故此，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中讲到："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21]此处认为马褂"古无今有"，是变易服色的结果。但任何事物变化都有前因后果，不可能凭空生造。对于清代马褂（自然包括黄马褂）的渊源，学界至今没有明确而深入的专题探讨。

（一）清代黄马褂的服制源头

与一般观点不同，在清代就有人试图梳理马褂的"华服"渊源。清康熙时人曹庭栋在《老老恒言》中指出：

> 隋制有名貉袖者，袖短身短，圉人服之，盖即今之马褂，取马上便捷，家居之服亦以便捷为宜。仿其裁制，胸前加短，襟袖少窄，长过肘三四寸，下边缝联，名曰紧身。随寒暖为加外之衣，夹与棉与皮必俱备，为常服之最适。[22]

曹庭栋将清代马褂的渊源上溯到隋代养马人所穿的貉袖。此后，乾嘉时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对马褂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

> 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战裙。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疑即古半臂之制。《说文》：无袂衣谓之𧜭。赵宧光以为即半臂，其小者谓之背子。此说非也，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马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刘孝孙《事原》：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则唐初已有其制。《唐书》：韦坚为租庸使，聚江淮运船于广运潭，令陕尉崔成甫着锦半臂、缺胯绿衫而裼之，唱得宝歌，请明皇临观。又曾三异《同话录》有"貉袖一条"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帛为之，仍用夹里，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仅起于唐、宋。按《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着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短袖由来久矣……[23]

赵翼认为马褂的历史不仅肇始于唐宋时期，进而前推至汉魏时期的半袖。《三国志·魏志·杨阜传》成书于西晋时期，《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24]。二者所载的"半袖"和"𧜭"，均被视为马褂的远祖。与此同时，训诂学家郝懿行《证俗文》对马褂的渊源做了考证，认为"半袖即半臂，是则汉魏以来已有此制矣"[25]，并援引顾炎武《日知录》的论述加以说明。郝懿行将罩甲、对襟衣和马褂视为同一事物，并将马褂的历史前推至汉魏时期的半袖（半臂）。上文中提到明清之际顾炎武对马褂的考证，据《日知录》之"对襟衣"条载：

>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戒庵漫笔》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说文》："无袂衣谓之𧜭。"赵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当时已有此制。[26]

顾炎武也将对襟衣等同于罩甲，并将其历史上溯到汉魏时期。既然明初曾明令只有骑马者才能穿着对襟衣，则对襟衣必然具备便于马上骑射的特征。由此看来，将对襟衣等同于马褂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创始于明武宗时期的罩甲，则与对襟衣一脉相承。故此，郝懿行称罩甲与对襟衣、马褂之间"状类一同"，只不过区别在于罩甲边缘有题识，便于行军打仗中区分士兵身份。及至清末，文廷式则明确将前代史籍中的"貉袖"、时俗所称"马褂"与当代典章中的"行褂"三者等同起来。其《纯常子枝语》载：

> 宋曾三异《因话录》云："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名曰貉袖。闻起于御马院，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著短袖，以其便于控驭耳。今士大夫亦服之。"余按：今世所行

马褂，殆与此类。汪芙生《松烟小录》云："揣曾氏说与今日行褂正相似。"《会典》"行褂长与坐齐，袖长及肘，用石青色。"㉗

综上可知，诸多清代学者已将马褂的渊源追溯到汉魏时期的半臂，明洪武年间的对襟衣则是清代黄马褂的"近祖"。明武宗正德年间创制的罩甲，极有可能就是清代马褂的前身。将清代马褂（包括黄马褂）视为纯粹的"胡服"肯定不妥。今人称"或云此制（笔者案即马褂）起于清代，本是胡服之一"㉘是值得商榷的，显然其源头并不是在清代。这一点从明清之际朝鲜人的见闻中也可得以印证，李民寏《建州见闻录》对努尔哈赤时期的服饰状况有如下记载：

> 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唐人所为也。衣服则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闻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是以服著，颇得鲜好云。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㉙

建州女真是女真各部中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先进的部族，但在朝鲜人眼中其服饰文明却极其落后。当时抢掠所得的"鲜好"服饰，其来源不可能是经济文化水平更为落后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只能是明朝。当时建州女真部族中从事织锦刺绣的工匠，也只能是掳掠自明朝的汉族工匠（亦即文中的"唐人"）。可以说，满洲的服饰制度从"杂乱无章"走向"贵贱有别"，离不开来自明朝的汉族服饰传统。马褂理所应当是这一服饰传统经过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之一。

不可回避的是，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㉚同样，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认为"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㉛，则胡服变易或扰乱华服的起始点也被认定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是对西晋末至北魏初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割据政权的统称。在此，二者将中国服制的"胡化"认定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齐自然包括在内）。虽然马褂同样具备窄袖、短衣的特征，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为清代的马褂是肇始于北齐时期的胡服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述，马褂的渊源在汉魏时期，此时尚不存在因北方胡族大举南下而带来的大规模胡服文化影响。当然，有人或许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视为中国服饰史上胡化的发端，并接续清代马褂与此事件的渊源，但二者之间的联系恐怕没有想象的那样直接。

马褂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的半袖或褶，但该服制在明代却受到官方压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曾明令"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士许服……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㉜，但随着时代推移，该禁令渐渐废弛。据李翊晚年所撰《戒庵老人漫笔》所载"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推测，至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㉝，明代的对襟衣、罩甲渐已走入民间。这一世俗化和普及化的过程，料想会对关外的满洲有所影响。满洲的崛起有赖于骑射之利，而对襟衣之类又便于骑射。在此情形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洲，学习借鉴明代的冠服制度则在情理之中。

当然，马褂获得尊崇地位是清代的特例。虽然梁启超"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的观点并不妥当，但清代马褂在冠服制度中的尊崇地位，则是"古无今有"的现象。清末民初人章炳麟在《訄书》也宣称"满洲游学以短衣，常居以婴绛，胡服著也。"㉞如果将"胡服"的概念界定为胡人"穿着"而非"创造"的服饰，那么，称清代"胡服"地位显著也未尝不可。

究其本源，马褂的形制在清代以前既已成型，只是没有像清代那样受尊崇。普遍采用马褂服饰的满洲，作为敌对势力，崛起于关外。旨在于恢复汉唐华夏衣冠的明代，固守于关内。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汉人故将马褂视为胡服。满洲民族虽然有其游牧民族的特性，但他的发展并未脱离中华大家庭，与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一直没有断绝。所以，满洲人的马褂受到汉族服饰传统的影响也很自然。不惟独满洲，也不惟独游牧民族，甚至所有惯于骑马打仗的人群，都会相应在服饰上加以调整。

“衣长至脐，袖仅遮肘”的服饰特征，并非清代马褂所专有，只不过马褂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已。

（二）太平天国对黄马褂的继承与更改

太平天国对黄马褂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更改，形成了看似毫无定制，实则仍有章法的服饰制度。据清末潘钟瑞《苏台麋鹿记》载，虽然“贼以官为妖，见朝衣、朝冠、补褂、翎顶之类以为妖器。人家有此服物则蹂躏益甚。”[35]从中也可以看见黄马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变异：

> 贼之服色，毫无定制。大略惟盘辫、裹头、短衣、散裤腿为一律。以五色绸绉条挂裤腰，以矜华美。衣似不拘，穿黄马褂者不甚显贵，即裹头亦不尽用红色，大率花布居多，黄者为大头目。或云脑后垂下者愈长愈贵，疑有尺寸之分。概不戴帽，亦或随取纬帽、凉帽戴之，不以为例。至于鞋则不袜，袜则不鞋，或并鞋袜俱无。[36]

可见，在太平天国政权中，黄马褂失去了在清廷中的尊崇地位。作为清廷的对立面，太平天国在冠服制度也试图做到有所区别的变易。纵使试图改弦易张，然就马褂（当然包括黄马褂）而言，太平天国在整体上却加以继承。据清末张德坚辑《贼情汇纂》载：

> 大抵伪冠服，初皆攫自戏班，既则任意造作。前次攻克岳州，获绣龙黄袍、黄马褂，绣“承宣”二字团龙黄马褂，及织金团龙黄马褂，錾金为字蟠龙金冠多件，制尤侈僭。盖贼中金银玉帛皆自掳劫而来，毫无顾惜，任意标新立异，穷工极巧。彼则欣欣自得，以为尊贵 无比，殊不知诡制亵色，俗恶不堪，真所谓槐国衣冠也。[37]

在清廷看来，太平天国的冠服制度是“标新立异”、“任意造作”的僭越之举。但太平天国的黄马褂并非凭空生造，而是对清朝黄马褂有着直接继承。天王身着黄马褂。东王以下，以至监军均身着黄缎马褂，军帅至两司马均着红马褂[38]。当然，太平天国的马褂在细节上肯定在加以处理，以示与清朝黄马褂的区别。从实物来看，窄袖的黄马褂已有明显增肥的趋势。清廷之所以对之加以“诡制亵色，俗恶不堪”的恶评，也可以视为是对太平天国篡改与“冒犯”清朝官服制度的反应。

三、结语

马褂因其简便易行，故与“宽衣博带”的明代汉人服饰相区别。皇太极曾比喻说，“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39]在此，皇太极强调满洲服饰的独特性、民族性。经过本文梳理可知，马褂并非满洲独创，而是肇始于汉魏时期的服饰制度。而汉魏时期的服饰制度，又是长期以来胡服、华服两种服饰文化长期交流的产物。故此，我们既不能认为清代的马褂是满洲独创，也不能认为是照搬汉族服制。历史时期内的文化交流虽然在方式和强度上逊色于当今，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过，这一点在满洲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也不例外。被误认为体现满洲民族特性的马褂，不过是对既有文化交流成果的扬弃。我们无意苛求皇太极洞悉以马褂为代表的满洲服饰的源流，但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必须明晰其间源流。单靠列举服饰、语言等某项文化要素的民族特色，借以整合成宏大的“满洲特性”命题，这一研究理路并不科学严谨。

当然，黄马褂从众多马褂中脱颖而出，成为清代政治生活中的体现皇权恩泽的工具的过程及其具体运作机制，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 32 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511 页。
② 郑天挺 《“黄马褂”是什么?》，载氏著《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63 页。
③ 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④ 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载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05 页。
⑤嵇璜纂：《皇朝通志》卷五十八《器服略三》“冠服”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八年浙江书局刻本。
⑥昭梿 《啸亭续录》卷三“服饰沿革”条，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55 页。
⑦庆桂等编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十三《丙辰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清嘉庆十五年武英殿刻本。
⑧章炳麟 《訄书（重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98 页。原书标点有误，有碍文意，略加改动。
⑨福格：《听雨丛谈》卷一“黄马褂”条，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 页。
⑩吴振棫 《养吉斋丛录》卷十六，童正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08 页。
⑪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487 页。
⑫吴振棫 《花宜馆诗钞》卷二《古今体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同治四年刻本。
⑬高士奇：《随辇集》卷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影印清康熙间刻本。
⑭朱家溍 《对〈我的前半生〉部分史实错误的订正》，《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 年第 3 期，第 84 页。
⑮《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乾隆四十一年二月。
⑯《清文宗实录》卷一〇九，咸丰三年十月。
⑰《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六，顺治八年夏四月。
⑱《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雍正四年五月。
⑲《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八十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
⑳福格：《听雨丛谈》卷一“黄面褂”条，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 页。
㉑梁启超 《变法通议》，载《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 4 页。
㉒曹庭栋：《老老恒言》卷三《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历代中医珍本集成》影印本，1990 年。
㉓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马褂、缺襟袍、战裙》，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703 页。
㉔陆宗达 《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年，引言第 1 页。
㉕郝懿行《证俗文》卷第二《半臂》，清光绪刻本。
㉖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第二十八《对襟衣》，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587 页。
㉗文廷式 《纯常子枝语》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三十二年刻本。
㉘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1 页。
㉙ ［朝鲜］李民寏：《紫岩集·建州见闻录》，杜宏刚等辑《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 10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89 页。
㉚沈括 《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胡道静校证，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6 年，第 23 页。
㉛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九十一《礼八·杂仪》，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2327 页。
㉜《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六，洪武二十六年三月。
㉝即李翊的卒年。
㉞章炳麟 《訄书（重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98 页。标点有误，有碍文意，略加改动。
㉟潘钟瑞 《苏台麋鹿记》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光绪间潘氏刻香禅精舍集本。
㊱潘钟瑞 《苏台麋鹿记》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光绪间潘氏刻香禅精舍集本。
㊲张德坚等辑，《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服饰”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大图书馆藏清钞本。
㊳苏石风等：《试论太平天国的衣冠服饰》，《戏剧艺术》，1979 年第 3 期，第 220-221 页。
㊴《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